

---

中国文学思想通史

---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

罗宗强 著

---

中华书局

中国文学思想通史

#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罗宗强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罗宗强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1  
(中国文学思想通史)  
ISBN 978-7-101-11378-5

I.魏… II.罗… III.中国文学-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  
时代 IV.I20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9791 号

- 
- 书 名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著 者 罗宗强  
丛 书 名 中国文学思想通史  
责任编辑 李碧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½ 插页 2 字数 420 千字
-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378-5  
定 价 58.00 元
-

#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建安文学思想	9
第一节 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	10
第二节 非功利、主缘情、重个性、求华美的文学思想的出现	27
第三节 追求慷慨悲凉的美	51
第二章 正始玄风与正始之音	57
第一节 正始玄风与士人心态的变化	58
第二节 表现老、庄人生境界的文学创作倾向	64
第三节 文学创作的哲理化	72
第四节 美文学技巧的进一步发展	81
第五节 正始玄风接触到的文学理论问题	85
第三章 西晋士风与西晋文学思想	95
第一节 西晋士风的变化	96
第二节 文学思想变化的缓慢的开始	105
第三节 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创作倾向	111
第四节 对文体特征的探讨	123
第五节 陆机《文赋》的理论贡献	133

第六节 重真情——西晋诗歌思想的别一支·····	143
第四章 东晋的文学思想·····	153
第一节 偏安心态与江南山水所带来的审美趣味的 变化·····	154
第二节 玄、佛合流与以玄理入诗·····	172
第三节 葛洪文学思想的意义·····	182
第四节 陶渊明的创作倾向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 价值·····	200
第五章 元嘉与永明的文学思想演变·····	207
第一节 文学环境的悄然变化·····	209
第二节 元嘉文学思想的新变·····	226
第三节 永明的文学思想·····	256
第六章 刘勰的文学思想(上)	
——刘勰文学思想的产生和《文心雕龙》·····	291
第一节 刘勰文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293
第二节 刘勰的生平和《文心雕龙》的成书·····	300
第七章 刘勰的文学思想(中)	
——刘勰的文学观·····	309
第一节 刘勰的杂文学观念·····	310
第二节 刘勰文学思想的主要倾向·····	315
第三节 刘勰的批评观·····	335
第四节 刘勰的文学史观·····	346
第八章 刘勰的文学思想(下)	
——刘勰的理论成就·····	363
第一节 刘勰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理论方法·····	364
第二节 物色论·····	373

---

第三节	神思论	380
第四节	风骨论	387
第五节	体论	400
第六节	势论	412
第七节	味论	420
第八节	术论	426
第九章	文学思想的多元发展	433
第一节	“文”的观念的辨析	433
第二节	主质朴、重功利的文学思想	442
第三节	尚自然、主风力的诗歌思想	449
第四节	重娱乐、尚轻艳的文学思潮	475
第十章	北朝的文学思想	499
第一节	北朝文学思想发展的背景	500
第二节	重实用、尚真实、求朴野的文学思想倾向	506
第三节	南北朝文学思想融合的趋势	517
结束语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527
部分引用书目		543
后记		553

## 引 言

本书的研究范围,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上起建安,下迄隋朝建立前夕,共三百八十余年。探讨这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它各个发展段落的特点,它在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种种理论问题,了解它史的发展面貌,当然,也评论它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 一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非常不幸的时期。它从那个产生了慷慨悲凉不朽诗歌的建安开始。这开始就弥漫在战火、饥荒和疫疠之中。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统一了全国,但不久八王乱起,继之永嘉南渡,统一的局面只维持了不到三十年,又开始了不断的征战和割据。在北方先是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的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后来是后魏(公元534年又分裂为东西魏)、北齐、周。在南方,是东晋、宋、齐、梁、陈。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这种更迭与割据,当然给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

为宽松的时期。自从东汉末年儒学一尊的地位动摇,经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繁琐注疏到义理化的改造之后,各种思想便也纷纷出现。玄风虽然消磨了一代士人的意志,使他们从他们前辈的军旅情怀摆脱出来,进入谈座,但玄学却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令人神往的辉煌。它把理论思维水平极大地推进了,深远地影响着思想史的发展进程。这是一个出思想家的时代。读这个时期的思想史料,你会惊叹像王弼这样一位只活了二十四年,从人世间匆匆走过的青年,何以会有那样不可思议的严密的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能力,何以会有那样深奥的理论创造。佛学也在这时得到极大的发展,它是那样自然、那样从容地融入中国的思想发展之流中,参与了理论的创造。这时的一些佛学大师,如道安、慧远等人,在思想史上可以毫无愧色地占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这也是一个艺术得到了高度繁荣的时期。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艺术成为我们国家的无价之宝,直至今日,也仍然是一座不易超越的高峰。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不朽的书法家。仅王氏一门,自王览以迄于王籍,著名书法家就有十二人。可以说,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家族,留下了如此多的书法名家。绘画、特别是人物画这时也得到迅速发展,绘画理论的成就,可谓空前。谢赫的六法论影响着我国绘画的发展历一千五百年而不衰,例如,“气韵生动”,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画家们遵奉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

文学的成就同样的惊人。我国的纯粹的美文学骈体文,就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代表着我国诗歌体式的基本特征的格律诗,就是在这时构拟了它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期为我国诗歌发展设计了一个大致的模式。也是在这个时期,



文学的各种表现手段、各种表现技巧纷纷出现,可谓斑驳缤纷。审视历史,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对此一时期的某些作者推崇备至,景仰不已,李白之于谢朓,杜甫之于何逊、阴铿,苏轼之于陶渊明,王夫之之于鲍照都如此。他们必定有他们推崇与景仰的理由。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对此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趋势持否定的态度。最早持此种否定态度的,似是隋人李谔。他给隋文帝上书,说:“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聘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辞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隋书·李谔传》引)他是从建安到齐梁一概否定了。这种观点,后来有了发展,论定齐梁为淫靡文风之渊藪。近数十年来,国内学术界曾经继承了这种观点,不过换了一种说法,称之为“形式主义”。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八十余年文学思想发展的背景,一个丰富多样、处于巨大转变中、因之也就让人议论纷纷的背景。如何来认识这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它的真实的面貌究竟是什么?应该给以怎样的估价?既涉及到考察问题的角度,也涉及到价值标准。而最终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总体判断。

## 二

我想在考察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发展时,努力遵循这样

几条原则：

一是努力描述出文学思想发展的真实面貌。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历史的还原上，所谓历史的还原，就是弄清一种文学思想从萌生到发展的种种表现形态，弄清它产生和发展的前因后果。在这样的时候，我特别注意文学思想在创作实践中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理论批评十分发达的时期，但是如果离开当时的创作实际，不惟无法了解其时文学思想发展的真实面貌，即使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很难作出符合于历史真实的解释。如果我们站得远一些，俯视这三百八十多年间文学思想发展的全貌，那我们就会发现，它的主体，是由创作反映出来的，理论形态只不过是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文学观念的升华而已，虽然它往往更明确也更深刻。在历史还原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士人心态的变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变化，当然和社会环境有种种之关系，如政局、社会思潮、学术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等等。但是，我以为，这些都不是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是士人心态。政局、社会思潮等等，是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思想发生作用的，士人心态是中间环节。考察士人心态的变化，可以对文学思想演变的种种现象作出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解释。当然，在历史还原的过程中，认真对待史料的甄别和解释，是不言自明的事。

二是努力寻找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各个段落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只有放到主要发展线索上，作总体的考察，才有可能了解它的真实含义，才有可能对它作出较为确切的判断。对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倾向的种种非议，究其原因，除了价值准则的因素之外，就在于对文学思想的发展主线缺乏了解。某一种文学思想倾向，如果孤立地看，它可能是不好的；但如果把它

看作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便可能是积极的、好的。对于这时期文学思想发展主线的把握,当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时期之内,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它之前和它之后,考虑整个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从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看,这三百八十余年,也不过是它的一个环节而已。离开了整个史的发展脉络,同样不易对这个环节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三是在考察这三百八十余年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时,我更多的是从文学自身着眼。对于文学思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认识与评价,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视角与标准。从不同的视角与标准出发,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我更重视文学的艺术特质,因之在描述文学思想发展的风貌时,也就更多地从这个方面着眼,尽量地不去涉及或少涉及非文学的东西,力图在清理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时,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

这样三个基本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是否已经做到,很难说;能说的是已经尽力了而已。

### 三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是沿着重文学的艺术特质展开的,重抒情,重形式的美的探讨,重表现手段、表现方法。似存在着一种把文学与非文学分离开来的发展趋势。

两汉文论主要倾向是重功利的,儒家思想起着决定的作用,大抵从政教之角度着眼,多主讽谏,崇实录,尚雅正;而较少从文学自身之特点着想。我以为,两汉论文,实兼及学术,司马迁、班固、扬雄以至王充、郑玄,莫不皆然。独立的文学思想潮流似未

形成。我想把汉人的诗、文观念称为前文学思想。

这种情形,汉末有了明显的变化,强烈抒情的诗(如古诗十九首)、抒情小赋的出现,意味着文学的抒情特征、它的非功利的性质正在被逐渐发现,同时,当然也就意味着由前文学思想向着文学思想转变的缓慢的开始。

魏晋南北朝当然继承了两汉论文的功利说(不仅魏晋南北朝如此,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莫不如此),但这主要的是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里,而在创作实践上,功利说的影响却甚为微弱。在创作实践里,继承的主要是汉末开始出现的重抒发个人情怀的、非功利的倾向。自建安以迄陈朝的终结,其中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大趋势是由功利走向非功利,是重文学的艺术特质。或者说,这是一个文学不断发现自身特征的过程。

随着经学束缚的解除,正统观念的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有如士人意识到了独立人格的存在一般,文学亦不知不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立存在。

正始玄学把哲理引入文学,它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开始在文学中表现老、庄的人生境界。它其实是把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带到文学中来了。刘勰所说的“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是不确的,老、庄之人生境界进入文学,乃是山水进入文学的前奏。山水意识是建立在老、庄人生情趣之上的。正始哲思进入文学,从其特质说,是建安重感情、重个性、重欲望的思潮的理性发展,乃是文学思潮非功利方向发展的另一个阶段。

建安以情,正始以哲思,西晋文学思想发展的走向则在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没有激情的一代士人,创造了缺乏激情的华美的文学。而由于对文学的特质的逐步认识,也由于玄学培养了高度思辨的思维方法,才使对于创作过程的思维活动和艺术技巧的研究成为可能。这就是陆机《文赋》之所以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曹丕的气说的提出是重个性、重独立人格的思潮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开了文学重其自身特质的先声的话,那么《文赋》就是文学重自身特质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产物。

永嘉南渡之后,文学思想的发展分成了两个不同步的进程。南方继续沿着重文学的艺术特质的方向迅速发展,理论建树卓著;而北方却是缓慢的、多少带着复归的意味,而且几乎没有理论上的建树。南北文学思想发展的不同步进程,深刻地说明着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当然,也提出了南北文风交融、渗透的诸多问题。

江左初期,玄学和佛学的交融促使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哲理化的倾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偏安的生活环境、明瑟的江南山水,玄、佛信仰的人生境界等种种因素,形成了一种崇尚潇散明秀、高雅脱俗之美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在以后的士文化传统里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刘宋以后,高门世族逐渐退出权力中心。门第虽仍高华而权力已不再无可争议时,人生的种种感慨也就随之而来了。这或者是刘宋之初文学创作倾向又从玄思回归到抒情上来的动因。谢灵运首先表现了这一点,他是从山水题材开始的。后来这种山水情怀使中国士人对山水的美产生了如醉如痴的向往,不是以玄对山水,而是以情对山水了。抒情的倾向很快扩及整个文坛,至鲍照而完全消弭尽玄风的影响。

元嘉的主要成就是使文学复归于抒情,使它成为一种纯情的文学。永明以后,则从抒情进而发展到装饰与娱乐,文学成为宫廷的文化装饰与士人的娱乐需要。文学思想的核心于是转向艺术形式之探讨。至此,文学在它离开功利目的、发现和探讨自己的艺术特质的路上已经走得很远。它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积累了许多艺术经验,需要总结;提出了许多问题,需要反思。于是此时便出现了我国古代文论史上最光辉的创造,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命题。而它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刘勰与钟嵘。当然,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文学思想的多元发展。这种多元发展或者跟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熟程度与反思有关。

至于北朝的文学思想的倾向,则主要是重实用,尚真实,求朴野。它为以后南北的融合,为唐代文学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又一个方面的借鉴。

这个时期也是志怪小说的繁荣期,但从文学思想的角度考察,诚如鲁迅之所言,“亦非有意为小说”,与诗文所反映之文学之自觉并不同步,视之为小说之萌芽则可,考其文学思想则暖而不明。是故不拟专章论述,拟放到唐代小说观中一并叙说。

自总趋势言,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文学的艺术特质逐步被发现和发挥的过程。对于这三百八十多年间文学思想的种种形态的是非功过的评价,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历史事实。这个过程发展到文、笔问题的讨论,本来有可能出现一种纯文学的概念,但是后来夭折了。这夭折,有中国文化的极为深刻的原因。

## 第一章 建安文学思想

建安文学的断限向有不同意见。我想把上限断在建安元年(196),理由有二:一是建安元年,曹操将兵迎献帝于洛阳,迁都于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政归曹氏。二是东汉后期的一批重要作家相继离开人世,如,赵壹死于建安前十八年,蔡邕和卢植死于建安前四年。而新的一代作家,有的这时刚刚步入文坛,如,建安元年,王粲二十岁,徐干二十四岁,吴质二十岁,杨修二十二岁;有的要到建安中期才成长起来,如曹丕和曹植。可以说,这时的大多数作家,都与曹魏政权有关。他们开创的文学新风气,当然与东汉末年的文学风气有衔接关系,但究竟已经不同,把这一代人作为文学新时期的标志,似较合适。至于建安文学的下限,我想定在魏明帝太和六年(232)。这一年,继活动于建安年间的重要作家先后去世之后,曹植也离开了人世;而下一代作家,如阮籍,才二十三岁,何晏也方进入文坛。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正始年间。正始文人出来,思辨的时代也就开始了,文学思想风貌又一变。

这样划分,建安文学共三十七年。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不仅决定了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对中国文学思想的特质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 第一节 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

建安时期,在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从重功利转到非功利。文学思想的这种转变,是从士人心态的转变开始的。

拿建安时期士人的心态与两汉全盛时士人的心态比,变化无疑是巨大的。不管这种变化对于中国士人以至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幸是不幸,只要稍为回顾一下历史,便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变化实在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士人从习惯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那样一种活跃的思想环境,到习惯于定儒术于一尊、皓首穷经,毕生精力用于法古崇圣解经、严守成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样,从儒家经典的禁锢束缚中解脱出来,重新活跃起来,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前一个过程,以建立正统观念为核心,建立起严格的等级制,天——君——臣——民,一切不得越轨。如王褒所说:“《记》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sup>①</sup>后一个发展过程,摆脱经学的束缚,也从正统思想的动摇开始。

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是附着在大一统政权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动摇,与大一统政权的动摇关系亦至为密切。公元105年东汉和帝死,子刘隆即位,生才百日,邓后临朝,与其兄邓骘掌握朝政,开始了东汉后期外戚专权的政局。第二年刘隆死,刘祐即位,才十岁,是为安帝。安帝在位十九年,死后阎后临朝,与其兄阎显擅权,立刘懿为帝。但刘懿三月即位,十月即为宦官孙程等

<sup>①</sup>《汉书·王褒传》。



所杀。孙程等又立十一岁的刘保为帝，开始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的政局。此后，外戚宦官便交替专权，直至桓灵之世而达于极致。此后，便是董卓的废帝，群雄并起，东汉以亡。现实政治生活中君臣之义既已紊乱，正统思想当然便惶惶然无栖身之地。从邓后临朝以后，这种情形便史不绝书。《后汉书·儒林传序》说：

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莧豎，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构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飧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主政者希望复兴儒学以维护大一统政权，但不管形式上采取何种措施，有何种变化，儒学的衰微却是无法挽回了。君臣之义既已紊乱，《春秋》大义便无法曲为之说。两汉儒学匡政的重要手段之一：以符命说灾异，至此亦慢慢失去效力。安帝时孔长彦长于章句之学，延光元年（122），河西雨大雹，安帝召问长彦，长彦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安帝虽有所感悟，而长彦却受到了外戚的憎恶。儒家的正统思想，与现实政治的格局，已经不能相容。它之